



红色历史映照党校初心

——山东省烟台市委党校的发展历史

□ 陈海涛

这是一所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党校，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它始终高举党的旗帜，紧跟党的前进步伐，充分发挥党校职能作用，为党培养了大批革命骨干和建设人才。它就是地处胶东大地、浸润着红色血脉的烟台市委党校。80余载奋斗征程，一直诠释着不变的初心。

与党的事业发展同频共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大量培养适应抗日战争需要的干部，1938年7月，在党的领导下，中共胶东特委党校在抗日烽火中诞生。1938年12月，更名为中共胶东区委党校。1950年5月胶东区撤销，中共文登地委、中共莱阳地委分别设立中共文登地委党校、中共莱阳地委党校。1954年两校分别更名为中共文登地委党校班、中共莱阳地委党校训班。1956年2月，文登专区并入莱阳专区，党校班合并。5月，中共莱阳地委党校班又改称为中共莱阳地委党校。1958年11月，更名为中共烟台地委党校。1967年2月，党校停办。1972年10月，重建中共烟台地委党校。1983年8月，更名为中共烟台市委党校。2018年10月，形成中共烟台市委党校、烟台市行政学院、烟台市社会主义学院“一校两院”的办学格局。从历史沿革中可以看出，自建立之日起，烟台市委党校始终坚持党校姓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努力承担为党培养干部的职责使命，并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

历经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党校，在转战胶东大地中经厉血与火的洗礼，在革命战争的硝烟中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12月，日寇出动上千人发动冬季大“扫荡”，胶东区委要求抗日干部群众立即转移。在转移过程中，胶东区委党校被日寇包围在掖县三元乡河南村（今莱州市驿道镇河南村），从校长到学员人人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战，在人数敌众我寡、武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大部人员突出重围，但校长李辰之和教员共27人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2年冬，日军大“扫荡”，党校的警

卫连冒死投入激烈的战斗，2位同志在突围战中壮烈牺牲。当时，为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胶东区委党校结合学员组织纪律性强、有群众工作经验、行动听指挥的特点，把教员与学员武装起来，实行军事编制。这样，党校就成为一支具有战斗能力的武装力量。有了敌情，党校就是军队，学员放下手中的书本，拿起枪杆就能战斗；情况稍有缓和，他们就放下枪杆，拿起书本继续学习。战火的洗礼与考验使党校成为既是宣传队又是战斗队的大熔炉。

塑造了历久弥坚的优良作风。这集中表现为党校在办学中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 and 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理论联系实际是办学方针。20世纪40年代前期，为促进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党校开设的干部轮训，长则半年，短则三四个月，非常注重联系实际、增进团结。党校把根据地建设作为教学重要内容，坚持教学为根据地巩固和建设服务，努力促进干部学员思想政治水平的提高，教育引导他们在斗争中长才干、强本领，推动根据地建设大发展。勇于创新是办学特质。在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党校积极探索创新，总结出在战争中心办学的成功经验：依靠群众，分散教学，避敌锋芒，保存力量。在转移行军中，党校教员兼任连长职务，使战斗行动指挥与教学计划实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教学方式上，平时以连队为单位集中实施教学计划，遇有战斗情况或执行任务时，则分散教学，以排甚至班为单位上课。枪声一响就是战场，枪声一停就是课堂，游击战争打到哪里，哪里就有党校的校址。艰苦奋斗是办学本色。艰苦的斗争条件，给党校办学带来了挑战，但也磨砺了党校师生的革命意志，培植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胶东区委委书记王文曾任党校校长，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保持勤俭办学的好作风。党校学员以苦为乐，以场院为课堂、以背包为坐凳、以双膝为书桌、以树枝为铅笔，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和学习热情。优良作风源于党校砥砺奋进的发展史，与赓续传承的胶东红色基因紧密相连。

为党培养和输送了大量革命骨干。80多年来，党校坚守办学初心，砥砺奋进使命，在各个历史时期培养了大量党的事业所需的干部和人才。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战争时期，在党校的受训干部就达4000多人。这些干部有的血洒疆场。时任胶东军区五师十三团团长的“胶东虎将”夏侯苏民，在攻克高密城的战斗中，胸部中弹，壮烈牺牲。1996年，为纪念夏侯苏民牺牲50周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为他的纪念碑题词——“气壮山河 流芳千古”。掖县委副书记邓季贤，在县委驻地被日军包围的紧急情况下，沉着指挥大家转移，自己却在掩护过程中不幸落入敌手，受尽酷刑，被敌人杀害。被称为“福山刘胡兰”的福山县妇救会长于敏，在掩护群众突破日伪军包围时不幸落入虎口，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她英勇顽强、坚贞不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干部成为共和国建设的先锋。从胶东区委党校走出的干部随人民解放军北上东北建立新解放区，南下江南接管新解放区。这些北上南下的干部遍布东北、中原、华东、西南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外交部副部长、水利部顾问等重要领导职务的宋健、仲曦东、林一山等都毕业于这所“红色学府”。

回望历史波澜壮阔，展望未来壮志豪情。新时代新征程，具有深厚红色基因和光荣革命传统的烟台市委党校将沿着先辈足迹，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更好践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继续书写新的华章。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市委党校）

红色记忆



陕甘宁革命老区的树

□ 高慧芳

子午岭位于泾河与洛河两大水系之间，横跨庆阳市四县的24个乡镇。司马迁《史记》中的那句“黄帝崩，葬桥山”更是为子午岭增添了神秘的历史文化色彩。由秦朝名将蒙恬领兵修筑、号称“秦代高速公路”的秦直道贯穿其间，串起历史与今天，也串起陇东与关中。子午岭原始森林覆盖着桥山山脉，是黄土高原中部重要的生态氧吧，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涵养和水土保持作用。

我来到陕甘宁革命老区庆阳挂职，这里被地质学家称为世界上黄土层最深厚的地方。千年风沙、沟壑纵横，沟梁塬卯、万木争荣，我最先见到的就是桑树。《诗经·豳风·七月》记载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斯，以伐远扬，猗彼女桑”的场景。“豳”，就在如今的庆阳和旬邑一带，是周朝部落的发祥地。在草长莺飞的春天，三月的桑树抽出了嫩芽新枝。人们拿起斧头，砍去长长的枝条，攀着细枝摘取嫩嫩的桑叶。《本草纲目》曰：“桑，东方之神木也。”桑树，是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一个代表性树种，有个村子就叫桑树洼（圪）村。桑树浑身是宝：嫩桑叶可以养蚕，木材纹理细腻、色泽美观，桑葚可以食用或酿酒，树茎和树皮还可以提取色素制造耐晒耐洗的衣物染料和具有抗菌作用的药物。最重要的是，桑树的精神气质和庆阳非常契合。它的生长速度很快，喜光耐旱，能够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周朝先祖在庆阳教民稼穡，耕种养蚕，开启农业文明的新篇。桑树也植根庆阳几千年，与这片土地互相依偎扶持，走过了漫长的历史。

梓树，是庆阳的市树，它具有高大笔直的主干，木材纹理天然美观，是古建筑中立柱的重要选材。而且，梓树的材质轻软耐湿耐朽，非常适宜制作乐器和雕版，是古代雕版印刷术的重要载体。与桑树一样，梓树从花、叶、果到茎、干、根都可以入药。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提到“桑、梓二木，古者五亩之宅，树之墙下，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我下乡调研时，发现农户几乎都是“前梓后

桑”，可见此言不虚。淡黄色的钟状花冠美丽淡雅、随风轻摇，拂动着游子的心。等到秋天再去探望，满树的“豇豆”悬挂在树梢，梓树蒴果累累，甚为奇特。《诗经·小弁》有“维桑与梓，必恭必止”，桑梓情怀，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毛泽东那豪迈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句，让我们对桑树和梓树代表的家乡充满了深情，也激励我们为了使它更美好而勇敢走出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动和落实，如何因地制宜在黄土高原腹地带领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成为基层工作的主旋律。具有突出经济价值的苹果树，就逐渐走向前台。位于北纬35度一带的庆阳地区，符合优质苹果生长的环境带。苹果喜光、耐旱，喜欢土质疏松、深厚肥沃的砂质壤土，天时地利使得庆阳成为苹果的重要产区之一。现在的庆阳，从黄土塬上到沟梁卯里，漫山遍野到处都有苹果树的身影。庆阳苹果作为甘肃知名品牌，已经成功入京。2023年12月，我跟随市上的农产品推介团队，回北京举行“庆阳苹果品牌推广会”，成立了庆阳苹果（北京）展示品鉴中心，老区的苹果也走上了京城人民的餐桌。令我惊奇的是，在庆阳我的宿舍往东十几分钟车程的温泉镇刘家店村，有一棵60多岁的苹果树。苹果树龄一般在15—30年，这棵60多岁的苹果树却依然枝繁叶茂、扎根深土，焕发着勃勃生机。

庆阳还有一棵樱桃树颇负盛名，在正宁县调令关秦直道入口处，有一棵500多岁的樱桃树。樱桃本身喜欢温暖的环境，在庆阳能有这样一棵樱桃树殊为难得。如今，庆阳大力发展农业经济，提升经济作物效益。特别是温室大棚和改良品种的樱桃已经成为新的庆阳一绝，甘甜硕大的樱桃既可以鲜食也用于酿酒。品尝一口味道醇厚的樱桃酒，仿佛品味到黄河文明和中华文化的绵延不绝。

庆阳的历史源远流长，不止于周朝先祖不窋。据考古挖掘的位于官寨镇南佐遗址的仰韶时期宫殿式建筑群，以及出土的大量碳化稻

粒经过碳14检测证明，这里的历史距今约5100—4700年。我在盛夏之际来到南佐遗址，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南佐遗址东南侧一棵高大茂密的核桃树。它有巨大的伞形树冠，如此一片凉荫，在日头正盛的黄土大塬上更显珍贵。我站在树下，看着满树悬挂着青青的核桃果，顿时心中满是欣慰。在庆阳宁县的乡村公路旁，还有一棵500多岁的核桃树。它高大的身躯接近20米，树冠更加壮观，盛夏之际展开可以覆盖一个篮球场。当地老百姓告诉我，这叫“佛手桃”，单是这一棵树，每年都能产青皮核桃2000斤。劳动者的智慧真是令人赞叹。

我以前在北京吃的核桃都是黑褐色的外皮，俗称“熟核桃”。来到庆阳之后，吃的都是白白的“鲜核桃”。青色的硬皮掰开之后，撬开坚硬的壳，白白的核桃果肉便映入眼帘。鲜核桃有一种独特的甘甜和嚼头，闭上眼睛，仿佛这黄土大塬的营养顺着树干流入核桃、进入口中、滋润心田。

庆阳还有一种抗风沙、耐干旱，在盐碱地上绽放光彩的树值得一提，那就是南梁的沙棘树。它实际上是一种落叶灌木，但是当地老百姓都喊它“沙棘树”。在干燥的环境下，沙棘结出的果实更加甜美可口。南梁生产的沙棘汁，虽然名气不大，但是甘甜生津。每次回京，我都要买上几箱，带回去请亲友品尝，恳请他们大力推荐老区庆阳的农产品。2024年恰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90周年，期待更多的人前来品尝南梁沙棘汁。

久闻庆阳镇原潜夫山有汉代学者王符的手植柏树，一直心向往之。我来到镇原博物馆并前往王符读书台的那天，正值倾盆大雨。1800多岁的古柏在风雨之中更加苍翠挺拔，镇原民谣曰：“夫子挑水润柏王，宁愿渴死不敢尝”。王符为了种树，亲自到西山挑泉水浇灌。路上遇到行人口渴讨水，他便把整桶水相赠，再去挑取新水。因为他想用纯净的泉水滋养柏树。于是，老百姓都知道了他的虔诚之心，甚为敬佩，对柏树也更为爱护。庆阳宁县湘乐镇字村庙有两棵古柏，树龄近2000岁。两棵古柏相

互依偎、风雨同舟，如今枝叶交错、和谐共生，老百姓戏称“字村壩上一大景，两个柏树一个顶”。在庆阳宁县的一个小坳村里，有一棵1300多年的栽种于唐代的古楸，它历经风雨洗礼，却日益繁茂。楸树是庆阳的本土树种，高大挺拔美丽。如今这棵古楸已经独木成林，巨大的树冠传说曾经引来凤凰，所以被誉为“凤凰楸”。距离凤凰楸不远的新华村，有一棵1400多岁树龄的千年皂荚王。树根相连、枝干相依，让人们感受到长相守和连理枝的力量，这棵古树也被誉为“爱情荚”。

庆阳的老城——庆城作为4000多年来一直有人居住的古城，美名享誉四方。周祖陵上柏森森，始祖遗迹何处寻？庆城周祖陵山上的树木以松柏为主，大多是近几十年植树造林的成果。庆城的古树，南十里坪有一棵松树值得一说。大家提到庆城，首先想到的是范仲淹，他于1041年出知庆州，保护一方安宁，促进民族融合，父子三人四知庆州，并留下千古名篇《渔家傲·秋思》。其实，还有一位北宋将领贾岩从河南奔赴庆阳抗击西夏，并受到宋哲宗的嘉奖。贾岩后来逝于庆阳环县，被安葬在庆城南十里坪。他的后人在清朝嘉庆十年种了606棵松柏槐树，可惜岁月不居大多已经随风而逝，惟余一棵松树即使被摧残卧倒在地，依然不屈不挠地生长，被当地的百姓尊称为“卧龙松”。

不仅有卧龙松，还有卧龙槐。正宁有一棵从北京而来的槐树，是明代崇祯四年的进士巩焄在京城做官时带回庆阳老家的。他一共带回三棵树，如今只有一棵槐树硕果仅存。历经风雨，老槐树已经千疮百孔，每到春来依然绿叶随风摇曳。

环县也有9棵苍劲挺拔的古松，它们高高矗立在四合乡乡的兴隆山上。这里有红军长征在甘肃境内的最后一处宿营地，“鸡鸣听三省”地势险峻之地，如今百姓安居乐业，古松的枝干愈加遒劲有力，仿佛在诉说着世事变迁，期待着祖国更加繁荣兴盛。

（作者系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现挂职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韩愈笔下的动物

□ 段培华

与众不同。他笔下的马，能日行千里，饭量比较大，一食或尽粟一石；他笔下的龙变化莫测、泽被万物；他笔下的麟，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也就是说，他笔下的动物不常见，与其他动物长得不一样，本领也不同。

韩愈深知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让这些动物发挥作用。他在《马说》中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龙说》中他写道，“云，龙之所能使为灵也；若龙之灵，则非云之所能使为灵也。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怪物，“其得水，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其不及水，盖寻常尺寸之间耳”。总的来说，马需要伯乐、龙需要云、怪物需要水。此外，韩愈认为要让这些动物发挥作用，还需要正确的方法。就像千里马一样，如果“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那么再好的千里马也无法发挥作用。

动物是韩愈施展才华的对象。韩愈贬谪到潮州后，当地经济还不

发达，自然条件恶劣，有大量鳄鱼伤人伤畜。所以，鳄鱼成了刺史韩愈的施政对象。在《鳄鱼文》中，韩愈先礼后兵，给予鳄鱼一定的祭品后，限期让鳄鱼迁出潮州，如果鳄鱼不在规定的时间迁走，就使用武力将鳄鱼猎杀。据人们传说，鳄鱼感受到韩愈的决心与魄力，自行迁走了。

动物是韩愈寄托情感的对象。韩愈笔下的名马会祇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因为得不到伯乐的发掘而碌碌一生；笔下的怪物非常依赖水，需要水才能风云变化，但是怪物没法自己得到水，只能依赖他人提供水，结果因为没有水只能平凡终了。在《感二鸟赋》中提到，某日，他在路上遇到了地方官进献给皇帝的两只鸟，他感慨这两只鸟因为长得特异就可以被地方官“引荐”给皇帝，而自己却不如此两只鸟。他在《答柳柳州食虾蟆》中提到，在当地经常见到虾蟆，这种虾蟆“鸣声相呼和，无理只取闹”，总是扰乱他的心神，感叹自己被贬后只能与虾蟆为伍，连觉也睡不好。不过，慢慢地他适应

了潮州的生活，从看着虾蟆就烦恼转变到能够以之为食。此外，他还借动物以明志，如果自己一直不得志，那么“烂死于沙泥，吾宁乐之。若俯首贴耳，摇尾而乞怜者，非我之志也”。

总的来说，爱写动物与韩愈的自身经历直接相关。韩愈是个大文豪，也一向勇于任事。唐宪宗时，平定淮西后彰显武功的文章即是韩愈执笔撰写；唐穆宗时，也曾不畏死向叛军宣达朝廷旨意。但是中晚唐时期的主要时局是削平藩镇、收复河陇等，这些需要用武力，韩愈一直不得重用，难免意难平。当他苦闷之余，把独特的视角放在与人类有关的动物身上，感受到各种近乎相同的品质或境遇，于是笔底生花，为文学宝库贡献了各种丰富的“动物”文章。

